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认识与展望

——政治和经济论文选集

〔荷兰〕约普·登厄伊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认识与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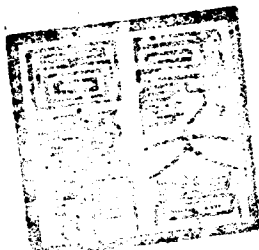
——政治和经济论文选集

〔荷兰〕约普·登厄伊尔 著

霍德喜 冯义宾 译

刘特平 刘 钢

施辉业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J. M. DEN UIJL
INZICHT EN UITZICHT
OPSTELLEN OVER ECONOMIE EN POLITIEK
UITGEVERIJ BERT BAKKER

AMSTERDAM, 1978

根据阿姆斯特丹佩尔特·巴克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认识与展望

——政治和经济论文选集

〔荷兰〕约普·登厄伊尔 著

霍德喜 冯义宾

刘特平 刘 钢 译

施辉业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54,000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800 册

书号：3188·66 定价：1.35 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约普·登厄伊尔 1919 年出生于一小商家庭。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后,当过几年公务员和记者。1949 到 1963 年领导荷兰工党理论机构并担任工党理论刊物的主编。几乎与此同时,即从 1956 到 1962 年当议员。1962 到 1965 年任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委员。1965 到 1966 年任经济大臣。此后任工党议会党团团长,逐渐成为工党领袖。1973 到 1977 年任首相。1977 到 1981 年又任工党议会党团团长。1981 到 1982 年任副首相。此后至今任工党议会党团团长。此外,近几年来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和欧洲社会党联盟主席。十几年来,在登厄伊尔领导下,工党已成长为荷兰最大的政党。

1978 年秋,为了满足荷兰公众进一步了解登厄伊尔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愿望,荷兰佩尔特·巴克出版社首次汇编出版了题为《认识与展望》的登厄伊尔论文集。这些论文虽然只是登厄伊尔从四十年代至今发表的大量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但经过选编,确实反映了他思想上许多方面的内容,也反映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普遍探讨的问题。因此,我们从中选了十五篇讨论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欧洲保守主义、欧洲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等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的文章,译成中文,供我国读者研究。

在这些论文里,登厄伊尔强调说,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在五十年代初彻底改变了方针,由此逐步实现了自己的许多“理想”,

例如促进了经济进一步“社会化”，加强了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他说，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变得更人道了”，虽然资本主义的力量还很强大，但“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已经消失了”。他认为，“民主监督”的重要成果导致了今天“不再有危机”，今天的生产体制已经不是“自由企业的生产方式”，而是“平衡”的生产方式，国家再也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工具”，而是“可以被用来领导走向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的发展进程的机构”。他还说，“经理、高级官员、自由职业者和金融贵族”取代了传统的资本家，但前者并没有构成“阶级”，而是“社会的最高阶层”，“地位”已经代替了财产的作用。显而易见，登厄伊尔上述观点都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确，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修改了自己的纲领，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战后西欧社会的新变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扩大了影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发生了象他所提到的那些根本变化呢？

登厄伊尔自己就说过：“社会主义运动至今确实还没有能够帮助我们的社会改掉一些基本缺陷。”他还谈到，尽管“阶级敌人”不见了，但不能说现代社会是“拉平了的中产阶级社会”，原因在于仍存在的“资本主义力量”不断地使人们“对社会异化”，从而影响了低收入阶层同其他阶层的“统一”，并且致使“实现机会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说，因此，福利国家里新问题仍然很多，甚至可以说福利国家不仅没有触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且还存在“富裕中的贫困”，现在市场饱和了，能源和原料短缺，1973年后经济大发展终止了，过去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企业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生产组织日益庞杂，人们几乎无法认清社会问题的实质，许多社会过程似乎失去了人们的控制，原子技术的发

展所导致的核战争危险就是一个例子。他还说,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已经登峰造极,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威胁世界的“力量平衡”,苏美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划定经济和军事界限的斗争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而联合国却因权力不足始终未能制止军备竞赛。在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登厄伊尔强调说,七十年代初美元贬值和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使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的状况,此外,廉价能源的时代结束了,这一切不仅带来困难,而且宣告了自由经济彻底破产。应当指出的是,登厄伊尔揭露了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研究他的有关阐述是有意义的。然而,关键问题是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在许多论文里登厄伊尔谈了自己的主张。

登厄伊尔宣称,“社会主义运动致力于建立没有阶级矛盾、不再有人剥削人、再也没有一些人由于有财产而统治其他人的现象的社会”,生产要“始终满足人们的需求”,要消除社会上的异化,实现“人类的本质”。他说,应当看到,在工党从一个“工人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党”和福利国家完善化的过程中,工党不能光搞物质建设,而也应当实现“发展机会平等”和“基本的民主化”,否则就会出现“经济主义”,“社会主义”的墙角会被挖掉。他要求工党党员努力学习理论,说“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机会主义”,要研究福利国家的实质。他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开展反对拥有“权力地位”的人的斗争,而不是开展反对“不劳而获”的人的斗争。他提出,政治家的任务是认清复杂的社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实质,发动“普通人、工人、教授、企业家等”开展反对庞杂的生产组织的“革命”,但要抛弃把“阶级斗争”当作“夺取政权的手段”的作法。他主张通过大抓教育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进入“领导人”阶层,从而促进社会的“民主化”。他主张通过实行“企业改革”和“参与决定制度”来使政府和雇员也

能掌握一部分企业的财产,要监督跨国公司,要通过征税、控制投资、限制利润等办法削弱资本家的地位,还要通过工资政策调节经济。他认为,在“计划和竞争的关系”方面,“计划”是“最主要的手段”,一方面要给自由企业留余地,另一方面要有国家的“协调”,国家要发展技术、服务行业和消费品生产,使经济“缓慢地和有选择性地增长”。他还主张,在国际上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例如建立类似“欧洲计划局”的各种“共同体系”,要“整顿国际秩序”,例如要靠“第三世界的政治权力”、南北关系和经济增长来制止“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在综合考察了欧洲保守党和自由党的特点之后,他还提出,西欧各国的主要政治矛盾是“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大大不如“保守主义”,而且四分五裂。他说,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取胜的原因在于它善于根据不同情况与不同的政治流派建立各种联盟,所以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

总之,登厄伊尔的著作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工党的主张,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欧特别是荷兰的一些政治情况,但是,登厄伊尔毕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自己也坦率地说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国家的许多观点过时了。这在他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文章中尤为突出,因此,读者在阅读登厄伊尔的论文时,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

施 辉 业

目 录

作者说明	1
技术在人人都互不相识的社会里的进步(1947年)	3
作为政治运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1956年)	9
理论和运动(1956年)	35
明天的世界里的劳动(1956年)	44
基本的民主化(1957年)	62
1959年的马克思主义(1959年)	75
工党新原则纲领里的经济问题——在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1960年)	89
生活的质量(1963年)	98
福利国家的贫困(1965年)	112
社会主义运动和新的社会批判理论(1970年)	122
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式生产(1974年)	134
好好读书是创造性的活动(1975年)	153
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977年)	164
欧洲市场经济的未来(1978年)	180
展望未来(1978年)	189

作者说明

在1977年荷兰的组阁活动中,关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讨论很热烈。在范阿赫特内阁^①采取行动之后,人们更加明白了,在组织和领导社会方面,我们面临了具有深刻意义的选择。在国际上,世界经济持续不断的停滞状况和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失业现象,也都导致人们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若干基本方面进行重新认识。

目前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也是必要的,它的现实意义促使我汇编我在过去的年代里就这些问题所写的文章。汇编的顺序正是这些文章发表的顺序。起初我只想汇编最近几年的几篇文章和几次讲话,但事实很快表明了,今天的问题也是昨天讨论过的问题,虽然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我从某一个问题的问题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正在讨论核电站超离心机工程时,有人提醒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就对社会来控制和管理核能的问题很感兴趣。

因为应当做到知己知彼,选集里也汇编了关于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可以被视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在图书馆委员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可能有些离题,虽然我希望其内容符合选集的主题。

选集里汇编的文章并不是任意选择的,这种选择主要是由主题决定的。我最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积极性是在1951年集体编写《走向自由之路》^②的时候,但因为该出版物篇幅太大,所以

没有编入选集。选集并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历史著作，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比选集所反映的要多得多。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中也可能有一个转折。六十年代初以前写的文章的特征是，它们都主张在福利国家结构的范围之内，实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良。从1963年的《生活的质量》起，我的文章更多地主张改造社会结构本身，实现另一种组织形式和重新分配权力。

这些文章是昨天写的，但它们着眼于明天。为了强调这一点，补充了一篇没有发表过的、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选择的文章：《展望未来》。

正如所有汇编这类选集的人一样，我也面临了这样的选择，要不要修改和润色这些文章呢？要不要维持原文，从而不可避免地需要说明和解释已经过去了的一些情况呢？我选择了后者。我删掉了一些多余的东西，补充了一些脚注。任何一篇文章的内容我都没有改。我希望我当时采取的立场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尽管这些文章的性质介乎于我同样喜爱的科学的经济论文和政治性的传单之间。

约普·登厄伊尔

1978年8月写于阿姆斯特丹

① 1977到1981年的荷兰内阁。范阿赫特是荷兰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他这次组阁没有吸收工党人士参加内阁。——译者

② 荷兰工党1952年通过的纲领。——译者

技术在人人都互不相识 的社会里的进步

(1947 年)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如何防止未来战争威胁方面，我们正在失败。全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但是各国却都在备战。这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心理上的备战活动日夜不停地进行着。几年前还有人宣布要建立“统一的世界”，但现在出现的却不是这样的世界，而是连现存的一些国家也发生了分裂的世界。全世界各国人民曾对联合国寄予希望，但联合国所拥有的权力不够，以致在讨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时，人们事实上忽视了这个论坛。军国主义正在全世界猖狂地得到推进。在和平时期的武装人员这么多，这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具有伟大的反军国主义传统的大不列颠和美国，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也倾向于采用“现实的”解决办法。曾经使德国和日本覆没的普鲁士病开始感染给战胜国（摘自美国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的声明）。

对目前局势的这种描绘太暗淡了吗？它是一项包含着我们早已不感兴趣的、仅供作者们自我欣赏的那种廉价的、耸人听闻的因素的声明吗？然而，发表上述声明的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是由一些责任心很强而又十分谨慎的科学研究人员组成的，他们绝对不会毫无根据地发表影响这么大的见解。另外，这个声

明也得到了美国各个领域的一系列科学家组织的支持。但谁要是对科学家们的政治表态还有半点怀疑，那谁就应当搞清楚原子科学方面的情况。在很短的时间中，原子弹曾引起了很大的不安。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已经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一项技术发展都有其阴暗面，现在他们突然猛醒了。在很短的一个时期里，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即由于人们认识到全世界应当为对付这种可怕的危险而团结起来，人们力图打开通向迄今为止未获成功的国际合作的大门。然而，这种恐惧已经在一些新的耸人听闻的事件中消失，不安的心情也由于人们对这么多的危险习以为常而消失。虽然进行了两年多的努力，但人们在对原子能的使用进行国际控制的道路上，还是没有能够前进一步。因此世人心中的不安消失了，世人再也不迫切寻求一种解决办法。

或许原子能专家们自己对于这种灾难性的发展趋势并非完全没有责任。或许他们由于把原子能问题孤立起来了，从而过多地和过分片面地强调了一点（而这一点却只是一个包括许多方面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这些问题。在一个几十年来允许其生产力和技术发明经历灾难性的发展过程的世界里，不能指望，人们会在这种事态发展中，在一个新的关键问题上，突然把利润和自身利益置于不顾而达成理智的妥协。在错误道路上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事情，人们是不可能只用两年时间就矫正过来的。解决原子弹问题是同解决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不协调的问题分不开的。

现在可以看到的灰心丧气和漠不关心的情绪，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为实现所有国家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各种提案一再地遭到否决，在普通人当中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原子弹的遭遇同裁军和其他所有美好的理想的遭遇是一样的——事实上只有战争才能

裁军，也只有核战争才能“解决”控制原子弹的问题，但请注意，这种控制只能维持到下次战争爆发之前。这种心理是正在毒化全世界的毒气，只有消除了这种毒气，才存在略有成效地完成任务的前景。目前，我们在完成这项任务方面却正在失败。

如果拿我们社会控制这一类问题的能力来衡量的话，应该说，发明原子弹是今天最不幸的事情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出现了所谓“强调经理的作用的趋势”。这种趋势使我们社会的骨架更加不清楚，人人都互不相识，其成员的责任心越来越淡漠。美国的詹姆斯·伯纳姆教授^①在他的题为《经营管理革命》的著名小册子中，分析了这种现象。他尤其认为，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即掌握对社会的领导权的不是工人阶级（象社会党人所希望的那样），也不是政治领袖（象自由党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支配生产部门的经理阶级（即组织者）。他把组织者接管权力的现象称为“经营管理革命”，他在194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时认为，在所有工业国家里，尤其是在俄国、德国和美国，都在进行这场革命。现在我并不想谈伯纳姆的这些论点以及人们对这些论点的不同意见。然而，他最主要的观点并不是新的东西；至于那些观点的主流，它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当一个人现在对原子问题的事态发展有意见时，他实际上不知道应当向谁提出自己的抗议。

人们习惯于指责“资本主义”，但控制原子能利用研究和原子弹生产的到处都是国家。在这方面美国并不比苏联差。

另一些人会指责“俄国”。但是，苏联并没有发明原子弹，而在表现民族主义方面，各国并不互相让步。

第三种人会说，应受到指责的是“那些制造了原子弹的科学

^① 1902年生，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译者

家”。然而，这些科学家一般都是一些好心的实验能手，他们除了为人类服务之外别无他求。

当前事态发展的特点正是人人都互不相识的这种状况及其影响，即缺少责任心的状况。阻碍问题得到解决的，不是几个唯利是图的无耻之徒，也不是某一个罪恶民族，而是那些神秘莫测和隐匿的制度、组织、办公室和委员会。正是这一点使得局势没有希望了，并使公众寒心了。人们已习惯说，道德觉悟的发展赶不上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效率标准处于支配地位的状况、对更大规模的生产和更高利润的追求，以及关于永无停顿的进步的幻想，这一切都把我们拖进了那些不以公民意志为转移的、过着自己生活的庞大组织中去。这种组织是在起作用的，但这种作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却不得而知了。发明工作在继续，但其目的又是什么呢？组织者们作出决定——又是以谁的名义呢？民主变成了一种信仰，一种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但有多少人实际上还能对社会施加一点影响呢？那些作出决定的集团，起码是那些认为自己是推动着自己的组织内部作出决定的集团，都会很自然地陷入孤立。这些集团都有自己的词汇，其成员是通过各自的眼光和动作互相认识的。不论是企业领导人、将军，或者是党的领袖，一概如此。在现阶段里，说出自己看法的平民百姓已变成了有点可笑的稀罕玩艺儿，他的言论成了值得收听的广播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要么统一世界，要么不要世界”的呼声没有起到使人积极起来，而是使人瘫痪下去的作用。平民百姓可能还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这毫无用处。

这种灾难性的事态发展只有通过平民百姓、工人、教授或工厂主针对它进行一场革命才能加以制止。在封建时代作出重大决策的也只是少数几个人。但是，那时的决定的意义还没有当

今大企业中随便哪一个企业领导人每天作出的决定更重要。当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更严密和人口猛增的时候，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点燃了这样一丝希望，即相互负责的制度将会清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危险。事实证明，十九世纪孕育的政治民主没能使以后的技术发展和人类的幸福协调一致。由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由于这个社会只寻求蒸汽机和发电机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它们包含的破坏作用，所以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原子能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当蒸汽机的使用使得生产力能够获得很大的提高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也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却没有预防同样是这些生产力引起的危机和失业。当电的应用使人们有可能生活得更加舒适时，人们购置了冰箱和收音机，但人们并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轰炸机和 V-2 型飞弹。原子能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可能性，但这时的情况要比过去严重得多。目前已经出现了世界性的粮食短缺、一盘散沙的欧洲和原子弹。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那么要是过去让科学家们去钓鱼，而没有让他们去搞什么原子裂变，现在可能确实会更好一些。

1948年美国用于陆军和海军的支出将达九十亿美元，其中近一亿美元将用来进行对原子及细菌的研究。据估计，马歇尔计划范围内的对欧援助在几年中将每年需要五十亿美元。只有唤醒世界人民已经麻木了的责任心，才能使这种荒唐的局面得以改观。科学研究人员们应该懂得，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泄露给第三者，如果他们对这些成就所造成的后果不闻不问，那就是在犯罪。诚然，荷兰有一个议会外交委员会——然而，如果成立一个议会科学委员会，后者的重要性将会远远超过前者。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一段话中，谈到了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如果各国人民不要求对有关人类文明的继续生存拥有参与

决定权,那么制止目前的事态发展也就毫无希望了。政治家们的任务是,应当想方设法消除各种组织的隐匿状态,并重新认识那些目前正在秘密地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面目和责任。认识到自己对人类文明肩负责任的政治家的任务是,要使人民深刻地领会这样的真理,即如果不事先保证国际力量的平衡和对原子能发展的公开监督,那么,连为和平而发展原子能的工作,也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不把原子弹问题的事态发展当作对我们的警告(它警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并且只有当每个人都承担这种责任时,我们才能成功,才能对事态发展施加影响),我们就不会很好地完成任务。

作为政治运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1956年)

政治领域里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作为政治运动的自由主义似乎已告结束。在西欧国家，战后进行的最初选举给曾经盛极一时的各国自由党残余带来了极为可怜的结果。看来，本世纪初开始衰落的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正在走向谷底。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一部分在保守党里，一部分在社会党里找到了栖身之地。

第二次大战结束十年之后，如果说局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至少也可以说发生了变迁。如果说自由主义已经复活，那就太夸张了，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广泛反抗使自由主义政党和派别感到自己可以起重要作用和获得新的机会。1952年，美国共和党人获胜；1951年和1955年，英国保守党人获胜；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选举中出现了向“右”转的局面。提一提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上述反抗。

自由党领导人觉察到年轻人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鼓起了勇气。英国自由党主席说，“二十年前还是社会主义堡垒的机构现在已悄悄地改换了招牌，成了热情的自由主义的堡垒。如果说，1945年社会党人的胜利是由二十年代初的知识分